

社会资本与疫情风险的应对

边燕杰 缪晓雷 鲁肖麟 马旭蕾 郭小弦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是风险社会特征的集中体现。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社会资本作为有效的社会机制,能够通过提高感染知情程度、扩大公众的困难解决途径、调整人们的心态,帮助人们保持身体健康、维持常态生活、平稳渡过疫情。模型分析表明,以关系互动紧密性为特征的内聚社会资本的防疫作用是直接、正向、稳健的,而以资讯来源异质性为特征的外联社会资本是补充性的,其作用是间接、不稳健的。尽管疫情期间的居家隔离切断了人们的物理联系,但信息时代的社会资本通过线上社交打破这种隔离,帮助人们保持核心关系圈的紧密互动,维持广泛联系渠道,避免了风险社会中个体化的危害^①,在防疫和抗疫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 风险社会;疫情风险;社会资本;风险调适;个体化危害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1)05-0156-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17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7XJC8400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SK2021039)

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截至2021年3月下旬已导致全球范围内超过1.2亿人感染、270多万人死亡,引发了健康危机,给社会生活造成了三大困境。第一,人们的日常联系和近距离交往催发病毒快速传播,而医疗卫生专家系统在疫情暴发初期无法提供疫苗和特效药,使大多数人口不得不直面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生命健康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第二,疫情暴发期间的物理隔离使得人际联系和社会支持被迫中断或受阻,个体化趋势空前加剧,致使相当一部分个人和家庭难以维持常态生活。第三,惯常的生活秩序被陡然打破,疫情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情绪,驱使人们进入普遍的焦虑状态,如何保持积极心态来应对和调适疫情也成为人类面临的极大挑战^{[1](P129-135)}。

我们认为,应对和调适疫情造成的三大困境,是摆在人类个体和集体面前的普遍性问题。人际接触和大众聚集是疫情传播和暴发的社会条件,疫情暴发后居家隔离等措施切断了家庭成员与外界的物理隔离,有效控制了疫情的恣意蔓延。与此同时,家庭内外的亲情网络、友情网络、社区网络为人们提供情感支持,帮助人们减少心理压力,提高防护意识,加强防疫行为,从而有效避免感染,保持身心健康,平稳渡过疫情。换言之,人际社会联系及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本是一柄双刃剑:它既会在人类未知状态下导致疫情传播,又能在人类已知状态下发挥正能量,成为应对和调适疫情风险的有效社会机制。本文关注后一种状态,研究居家隔离条件下社会资本对于抵御疫情风险的积极作用。我们首先分别梳理风险社会和社会资本理论,进而就社会资本的作用,用最新调查数据检验相关研究假设。

一、风险社会与疫情

本文运用风险社会的概念和理论来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带来的影响,本节主要阐述风险

^① 个体化是指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个人越来越脱离群体联系和制约的一种趋势。

社会的基本特征、风险社会的个体化危害、疫情风险分配的理论逻辑与现实等问题。

（一）疫情的风险社会特征

风险社会的概念由贝克于1986年首先提出^[2](P1-43),之后经由道格拉斯、卢曼、吉登斯等学者的进一步阐释,将其上升为全球化条件下当代社会问题分析的核心理念。这些学者使用此理念全面批判和反思现代性,倡导通过制度创新来规避风险困境,设置预警机制,增强人类对风险的控制能力。在我国,自2003年非典肺炎疫情发生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风险社会的视角开展灾害研究,讨论灾害的来源和后果。有学者提出了中国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的论断^[3](P14-20),也有学者主张区分中国风险社会与世界风险社会,认为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和运行逻辑具有结构和文化特殊性,不同于贝克等人提出的风险社会研究范式^[4](P46-51)。风险社会理论中的若干判断,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今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社会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风险的全球性。现代社会是不同区域之间普遍联系、充分沟通、广泛交流的全球化体系,跨越民族、国别、经济体等界限,所以一旦某地区发生风险,就有可能影响全球。二是风险的人为性。当代人类处于“社会化自然”的生存状态之中,所发生的灾难与人类的行为决策紧密相连。一些利益集团做出的错误、失据、后置的应对决策往往恶化灾害后果,人为地加重了风险。三是风险的有限可控性。风险的全球性和人为性预示着风险的永久性特征,无法根除,但人们可以通过知识的力量预估其态势和后果,降低其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四是风险的双重性。风险是负面的,但它同时又衍生了各种机会,扩大了人类的可选择性。可以肯定,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人们生活的惯常秩序,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二）疫情风险中的个体与个体化

个体是风险的最终承担者,现代社会的个体化特征加剧了风险的灾难性后果。所谓个体化,是指个人独立性和主体性的相对上升,人们归属的社会群体,无论是性别、种族,还是社会阶层,都变为失却了实质意义的空壳结构,成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现代性问题^[5](P23-33)。当个体而不是集体,变成面对风险的主体,个体化的趋势成为风险社会的动力机制,整个人类社会就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

个体化令个人脱离了家庭、集体等结构性束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权。与此同时,个人也日益成为一座座孤岛,失去了社会支持系统。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家庭和宗族是人们的生存依托,而到了现代社会,人们从依赖熟人的社会支持转变为依赖社会保障体系,从相信直接经验转变为信任专家系统。而当疫情这类重大风险突然暴发,社会保障体系来不及作出紧急响应,专家系统也未能及时提供有效的药物和疫苗时,不确定性急剧增加。于是,每个个体面临重大的生存问题,生存安全感丧失,焦虑恐惧感增加,引发了吉登斯所谓的“本体性焦虑”现象:由于惯常秩序的消失、失灵或崩溃,人们产生了始终伴随日常生活的一种焦虑感,这成为个体生存的一般状态^[6](P183-193)。疫情发生后,尤其是在与外界隔离的状态下,物理隔离、停工停课等措施打破了惯常生活秩序,人们对于疫情何时能得到控制、生活何时恢复常态、经济何时复苏等毫无把握。广泛的焦虑、恐惧、不安、怀疑与风险相伴而生,无从消解。在社会生活的惯常秩序被彻底打破,新的秩序尚在建立的时期,人们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调适自己的心态。

（三）疫情风险分配的理论逻辑与现实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分配又遵循怎样的逻辑呢?基于贝克的理论,风险分配具有均等化倾向。但均等化是一种理论想象,其所谓的“财富分三六九等,而烟雾则一视同仁”只是理论逻辑中的可能趋势,并不能概括全部的社会现实。事实上,贝克自己也承认,风险的分配与财富的分配存在很大的重叠,它们都附着于地位结构,但与财富分配的逻辑正好相反:社会地位越高,财富越多,风险越小。这就是说,财富在社会上层聚集,而风险在社会下层泛滥。

上述理论判断在疫情中具有重要的行为涵义。首先,疫情风险本身存在群体差异。疫情来临时,社

会经济地位偏低的群体被迫外出采买维持生计,可能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承担着更高的风险。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则拥有更多躲避或远离灾难的机会^[7](P109-114)。其次,应对风险的能力也存在差异。疫情中能否及时买到防疫物资、生活用品,都会导致个体和家庭在抵御灾难的弹性、应对风险的能力上存在差别。最后,对于风险的认知水平存在主观差别。对于疫情的认识、对于防疫和抗疫能力的掌握,都会导致防疫行为和防疫效果的最终差异^[8](P1-14)。

事实上,疫情风险的分配并非均等化,而是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造成差异的因素存在多种维度。除了传统的收入、财富等经济资本之外,已有文献还发现了以文化教育和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人力资本在风险认知、规避、抵御等方面所产生的差异性^[9](P191-208)。此外,已有研究开始关注社会资本与灾后恢复的关系,其中的重点是关于社会资本对于灾后恢复的作用^[10](P164-187)^[11](P76-83)^[12](P214-237)。那么,对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社会资本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二、社会资本与疫情

为什么社会资本能够成为防疫和抗疫的社会机制?在这一小节,我们首先阐述社会资本的理论意义,然后剖析社会资本的多重功能,最后区分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即内聚社会资本和外联社会资本,分别讨论它们在应对疫情风险时的作用。

(一) 社会资本的理论意义

虽然贝克和吉登斯都认为个体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但与个体化相对应的人际联系性,则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是说,联系性是人的社会性本质。这一理论判断,在社会学领域不仅促进了社会网络分析学派的形成和发展^[13](P467-487),而且催生了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社会资本是当代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析框架,也是克服个体化与风险社会弊端的重要社会机制。

社会资本理论有其形成和稳定发展的过程。早期学者指出了社会关系的资源和资本性质,将其解释为个人经济回报的社会环境质量^[14](P153-186)。直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资本的关联性本质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布迪厄提出,社会资本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及蕴藏其中的显现和潜在资源的总和^[15](P241-258)。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发源于紧密联系的社会关系网络,有益于创造人力资本的积极社会结构^[16](P95-120)。林南从社会结构与行动者的互动视角提出了广为学界所接受的定义:社会资本是嵌入人际社会关系网络、为满足行为目标而动员的社会资源^[17](P18-27)。这些经典理论都说明,人际联系性是社会资本的必要前提,人际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结构基础,社会资本嵌入于人际联系之中。

社会资本存在于集体和个体两个层面。帕特南认为,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基于普遍互惠机制(generalized reciprocity),对于集体内部全体成员都有效,是一种维护集体利益、实现集体价值的一般社会资本^[18](P133-148)。而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是基于特殊性互惠机制(specific reciprocity),以人际交往为边界,以社会交换为目标,它能带来交换双方互利互惠的内部性,但也产生了排斥他人参与的负面外部性效应^[19](P1-22)。在围绕疫情的社会学研究中,已有学者从集体层面分析了社区的作用^[20](P1-26)。本文关注个体层面的联系性对人们有效抵御疫情风险的正向作用。

(二) 社会资本的多重功能

以联系性为本质特征的社会资本能够激发社会内部抵御风险的能力,帮助个体有效应对疫情挑战。从防疫和抗疫的分析目标出发,社会资本的四大功能特别值得重视。

一是信息传递功能。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聚集的复杂关系网络,也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国家、组织、个人只有及时获得非重复性的充分信息,才能做出正确决策,采取理性行动,成功应对风险和挑战,这就需要依赖社会网络的信息传递功能。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竞争场域,弱关系网络

和结构洞网络的信息桥作用不可或缺,并在中西方社会都被经验数据所证明^[211](P1-40)^[221](P66-99)。

二是人情帮扶功能。如果说信息传递发挥着浅层的、非目的性的交换功能,那么人情帮扶功能往往是深层的、目的性的互惠交往,其直接后果是资源的交换和行为目标的达成。研究表明,人情帮扶是频繁发生的,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人们由于资源短缺而不能凭借一己之力实现行为目标时,就会通过情感、信任、面子、送礼等机制求助于亲友和熟人,而在长期的人际交往中,求助者和施惠者又会转换角色,达到社会交换的均衡状态^[231](P944-974)。人情帮扶虽然是中国人关系网络的一个突出特征,但其现象遍布全球各个文化体和经济体^[241](P1-22),只是存在分布集中程度和影响程度的差别,其影响分为正负效应两个方面。

三是社会支持功能。这是社会资本的信息功能和人情功能的落脚点,是社会网络成员之间互惠交换的内容和结果。社会支持可以分为情感型和工具型,前者来自亲密关系纽带,在应对生活压力和身心健康方面发挥情感支持作用,而后者来自更为广泛的社会交换网络,在应对资源短缺、生活紧张等困境中发挥工具性支持作用,如协助解决择校、就医、求职、借贷等问题。

四是灾害救助功能。当灾害不幸发生,常态条件下的社会支持功能就转化为目标明确的救助功能。在西方国家,参与灾害救助的志愿者、社工、企业、非盈利组织,往往已与受灾群体建立了社会网络,在灾情期间开展后果评估、紧急救助、物资供应、情感支持等各种服务。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政府是灾害救助的主导者,但是群众自组织也是不容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在灾后社区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受灾居民在灾后恢复期间可利用社会网络资源,特别是强关系网络资源,获得正式和非正式支持,从而更快地恢复正常生活^[111](P164-187)^[121](P76-83)。

(三) 内聚社会资本与外联社会资本

帕特南概括了社会资本的内聚功能和外联功能^[181](P76-113)。内聚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表明一个群体内部、社区内部或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系程度越紧密,则人际信任程度越高,合作精神与认同越强,公共参与越积极,从而形成较强的内聚力。外联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是指群体之间、社区之间、组织结构之间的联系程度,可以从信任、合作、互惠、回报等维度来确定外联社会资本的质量。帕特南认为,一个有效运行的社会应该是内聚社会资本和外联社会资本都强的社会。

我们认为,在疫情暴发期间,无论个人还是家庭,如果拥有这两类社会资本,就能较为积极地应对疫情,较为顺利地渡过疫情。疫情中的内聚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以家庭为中心的核心关系网络,在共同防疫时的交往紧密程度。人们的亲密关系包括配偶/伴侣、其他家庭成员和交往特别密切的亲朋好友,它是个人核心网络的主要成分,其功能就是增加沟通、促进和谐、发挥群体内部凝聚力。已有研究表明,内聚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良性的家庭互动^[251](P1-18)。当然,人们物理隔离期间长时间与家人相处,互动频繁不免增加摩擦,产生矛盾和冲突。所以,如果内聚社会资本有较高的存量或增量,不但可以抑制和减少消极互动,还能增加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照和支持,以积极的姿态调整个体行为,应对疫情的种种变化和后果,平稳渡过疫情的艰难时期。

外联社会资本在疫情中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从个人和家庭层次来分析,疫情期间的社会资本是通过保持和拓展弱关系网络来实现广泛交流和资讯沟通的目的,特别是关于疫情的资讯沟通。在信息时代,拓展性的人际关系包括熟人和网友,还包括人们与之交换信息但不甚熟悉的其他人,被称为弱关系纽带,其作用是外联社会资本。研究表明,弱关系纽带可以跨越社会群体和其他结构边界,有效地传播非冗余信息。在疫情大流行的艰难时刻,通过外联社会资本获得关于疫情的及时、多样、非冗余的信息,能使人们保持警觉、了解实情、增加信心,以理性的平常心态面对疫情变化和意外后果。因此,资讯沟通渠道和内容越广泛,人们的防护行为就越有效,平稳渡过疫情的几率就越高。

三、研究假设

如前所述,疫情暴发后个人和家庭也将面临三大挑战。一是避免感染、保持健康的挑战。这不仅包括感染病毒的风险,同时还包括因物理隔离和社会孤立而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二是应对困难、维持常态的挑战。疫情暴发后人们面临防护物资紧缺、生活用品匮乏、无法正常工作等困难,日常生活受到影响,难以维持常态。三是调整心态、平稳过渡的挑战。疫情直接威胁了人们的本体性安全,使人们产生焦虑、恐惧、不安的心理,人们需要积极应对,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才能平稳渡过疫情。对于社会资本四个功能而言,信息传递是人际关系普遍联系的基本表现,人情帮扶、灾难救助、社会支持等功能则在疫情背景下起到重要作用。我们认为,社会资本是人们战胜三大挑战的有效社会机制,下面分别加以阐述。

第一,社会资本的帮扶功能是避免感染、保持健康。社会资本促使人们锻炼身体、增强健康状况,这已得到广泛的数据支持。从信息传递功能看,社会网络可以在风险和灾害发生前后发挥加快信息传递的功能。关于疫情的资讯沟通越广泛,人们应对疫情的信息和知识就越丰富,越有利于增加有效的自我防护行为。因此,社会资本有助于个体有效防护,降低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从人情帮扶功能看,在居家隔离期间,与家人、密友的良好互动和相互关照是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民间借贷、亲友间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医疗资源的获取和人们的保健行为发挥正向作用。可以预见,在疫情期间,社会资本既能通过亲密关系圈提供关爱支持和实际帮扶,也能通过广泛沟通提供异质性的信息资讯,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个体避免感染、保持健康,因此我们提出保持健康假设。

假设1(保持健康假设):面对疫情风险,社会资本有助于保持个体的身体健康。

第二,社会资本的救助功能是解决困境、维持常态。在现实层面,内聚社会资本在疫情风险中为个体提供紧急援助的安全网,发挥着人情帮扶和灾难救助的重要功能。在中国,很大一部分的社会保障和照顾任务由家庭所承担。由于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特征,家庭的概念和范围延伸得更广。中国社会的内聚社会资本因其有较大规模的拟亲情化网络、更强的互惠义务和稳定性、更高的功能复用性^[26](P107-113),在面对疫情危机时能够更好地分摊风险、调配资源,提供实际的支持。对社会资本与灾害的相关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可以为受灾者提供物质和心理上的支持。可以预期,内聚社会资本能够缓冲个体化带来的弊端,避免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为风险应对提供资源,减少个体的实际损失,因此我们提出维持常态假设。

假设2(维持常态假设):面对疫情风险,社会资本有助于个体解决困境、维持常态。

第三,社会资本的支持功能是帮助人们调整心态、平稳过渡。疫情的泛滥和物理隔离打乱了生活秩序,阻断了社会联系,带来的恐惧、焦虑、无助等负面心态严重时会导致个体被社会孤立。已有研究证明了社会孤立的严重后果:它会造成健康状况、主观感受、幸福体验的大幅下降。大量研究证实,社会资本的社会支持功能表现为抑制消极心态和减少社会孤立^[27](P240-248);社会联系越充分的个体,健康程度越高,幸福感越强^[28](P1-22)。社会资本在困境中帮助人们调节情绪、应对压力、保持心理弹性,其中家人、密友所提供的相互关怀和情感支持最为重要。同时,关于疫情的及时、多样化、非冗余的信息,既能使人们保持警觉、了解实情、科学防护、降低感染风险、保持身体健康,又能使人们减少对不确定性的感知,以理性、平和的心态来面对疫情风险和意外后果。当曾经的社会联系因物理隔离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时,信息时代的人们转而通过电子通信和社交媒体来打破这种隔离,用“增距社交”来保证物理隔离的实现,同时避免社会隔离。简言之,内聚社会资本和外联社会资本均有利于激发有效的防护行为,提升个体健康水平。因此我们提出平稳过渡假设。

假设3(平稳过渡假设):面对疫情风险,社会资本有助于个体调整心态、平稳过渡。

四、实证研究设计

实证研究设计的目标是获得和分析相关数据并检验研究假设。新冠肺炎疫情排除了入户面访的可能,因此笔者采用微信用户调查的方式,使用线上问卷的形式收集数据,概念测量和问卷长度必须考虑通过手机回答问题的情形制约,我们的相关研究设计如下。

(一) 调查设计与实施

本课题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全国进入严格防疫、全民抗疫背景下做的研究。由于疫情期间的物理空间隔离,传统的线下入户调查已经无法实施。因此,我们通过“调研家”数据收集平台开展线上调查,于2020年4月23、24日两天连续线上推送,被访者通过手机终端的微信软件接收问卷并填答。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微信的活跃账户约为11.5亿个,占全国人口的82%^[29]。“调研家”的样本框拥有全国城乡最为活跃的微信用户3万人,平均年龄30岁,教育程度偏高。调查的目标问卷为3000份,有8019位被访者填答了问卷。针对线上调查的天然缺陷,如机器人答题、答题不认真和答题疲倦等,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了质量控制环节,严格筛选合格样本。最终收集到有效问卷3009份。

问卷主要询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高峰时期的居家隔离状况。根据疫情发展的时间线——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通过央视确认新冠病毒“肯定是有人传人”现象,直至同年2月末3月初,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全国各地开始平稳有序地复工复产^①——因此,本次线上调查要求被访者填答自己在1月21日至2月29日期间的情况,该时间段对于调查疫情期间的居家隔离情况和社会交往情况有很好的代表性。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测量说明		变量	样本量	百分比
因变量	感染知情	3009	0.24	0.42	知情=1,不知情=0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658	21.87%
	健康变化	3009	0.80	0.40	保持健康=1,健康下降=0		大学(含大专)	2138	71.05%
	困境解决	3009	1.32	0.65	最小值=0,最大值=2		研究生	213	7.08%
	家庭关系	3007	0.87	0.33	无变化=1,紧张=0	职业	雇主	336	11.17%
	积极心态	3009	1.69	0.60	最小值=0,最大值=2		白领	1190	39.55%
	幸福感变化	3009	1.26	0.70	最小值=0,最大值=2		蓝领及以上	965	32.07%
自变量	关系交往紧密性	3009	12.32	2.81	最小值=0,最大值=15		无业	518	17.22%
	资讯来源异质性	3009	2.83	0.96	最小值=0,最大值=4	家庭年收入	<6万元	610	20.27%
控制变量	性别	3009	0.50	0.50	男性=1,女性=0		6-12万元	836	27.78%
	年龄	2998	29.08	7.45	最小值=16,最大值=66		12-20万元	625	20.77%
	年龄平方项/100	2998	9.01	5.04	最小值=2.56,最大值=43.56		20-30万元	542	18.01%
	隔离效果	3009	4.33	1.01	最小值=1,最大值=5	>30万元	396	13.16%	

(二) 变量设计与描述

首先是因变量。本次研究的因变量是人们对疫情风险的应对与调适,包括三个方面,每个方面分别设计了2套题,产生了如下6个变量。

感染知情。截至调查时点的2020年4月24日,全国的感染人数是84324人,每10万人口中约有6人感染,感染率极低。但是,如果被调查者的家庭、居住社区、熟人网络里,哪怕有一人不幸被感染,即使是

① 本文所引用的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报道,均来自官方主流媒体。

疑似感染者,都会引发人们的警觉和担忧,引发行为调整,因此感染知情进入了本研究的关注范围。为此,问卷中设计了4道题,分别询问被调查者、他们的家人、居住社区、相识人网络,是否有人成为感染者或者疑似感染者。四题汇总形成感染知情变量,表1显示有24%的被调查者处于感染知情状态中(均值=0.24),即每10万人有2.4万人是感染知情者,知情率远高于感染率。

健康变化。此调查使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自评健康量表,关注自评健康在疫情期间是否发生了变化。为此,我们设计了如下题器:“疫情期间您的健康情况是:显著降低、降低、无变化、提升、显著提升”,初始分析表明“无变化”选项为众数,占58.8%。我们更关注健康状况在疫情期间是否下降。为此转化为二分变量,上升和无变化占79.8%,下降占20.2%,可见疫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困境解决。疫情期间的困境表现在食品购买、生活服务、子女教育、老人抚养等方面,有的家庭还面临就医难、药品供应不及时、营养品短缺等问题。那么,如何解决这些困境?根据个案观察和深度访谈,我们发现困境解决过程中存在线下交流途径和线上交流途径的差异,因此设计了2道题分别询问被访者是否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解决困境:线下交流解决、线上交流解决。加总后的变量均值为1.32,取值越大说明解决困境的办法越多。

常态维持。疫情期间能否保持常态生活方式,这不但是人们应对疫情和自我调适的关键所在,且常态生活方式是一个内容丰富、边界宽松的概念,有多种测量手段。我们的理论立场是,如果疫情影响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常态,那么必将引发家庭关系的显著变化;换言之,保持家庭关系是维持生活常态的指示器。因此,我们在调查中询问被访者在疫情期间是否会有“家庭关系紧张”所带来的压力,得到二分变量:1=家庭关系无变化,占87.2%,0=家庭关系紧张,占12.8%,这说明疫情影响了部分家庭的家庭关系,破坏了家庭的生活常态。

积极心态。受疫情的影响,个人的社会心态会随着疫情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而改变,保持积极心态是应对疫情的重要指标。因此,本研究询问被访者疫情期间乐观和平静两种心态的出现频率,将两种心态转换为0-1变量,其中1=经常、有时出现,0=偶尔、从未出现,加总后得到积极心态的定序变量,均值为1.69,说明疫情期间的社会心态仍然比较积极乐观。

主观幸福。如果能够平稳渡过疫情,除了保持积极心态之外,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幸福感保持在原来水平,甚至有所提升。因此,调查中询问被访者“疫情发生以来,您自己生活的幸福感有何变化”。回答幸福感提高的被访者占41.2%,最终得到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的定序变量,均值为1.26,该变量的取值越高,说明疫情期间的幸福感水平越高。

其次是自变量。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疫情背景下的社会资本。由于线上调查的空间限制,不能全面测量社会资本的各个维度,因此本文主要考察个体层面的内聚和外联社会资本,设计了两个模块。

第一个模块测量内聚社会资本,变量命名为关系交往紧密性。家庭是产生内聚社会资本的主要场域,特别是面对疫情、灾害等风险时,家庭关系的规模较小、强关系多、同质性高,组成的核心网络可以带来更强的归属感,有利于人们在疫情、灾害中获得非正式支持^[10](P164-187)。本模块的测量题器包括:疫情期间参加家务劳动的时间、疫情期间的夫妻交流频率、疫情期间的夫妻关系变化、疫情期间其他家庭成员(父母、子女等)的关系变化、疫情期间与好友的线上交流频率。每个变量均用5点量表测量,加总后得到均值为12.32、标准差为2.81、取值范围在0到15之间的定距变量。定距变量的取值越大,说明个人的关系交往紧密性越高。

第二个模块测量外联社会资本,变量命名为资讯来源异质性。根据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测量逻辑,只要个人通过任何渠道与社会结构发生互动,无论是信息沟通、个人参与,还是双向互动,这些信息渠道都被视为社会资本。在信息时代,人际联系不再像往常那样依赖当面交往,网络虚拟空间的“缺位交往”已经成为重要的交往形式,所以我们测量外联社会资本时特别关注网络社交和网络资讯来源,测量题器包括:疫情资讯来源是否通过社交软件(微信、QQ等)、社交网络平台(微博、知乎等)、电视和广播电台、

新闻资讯平台(今日头条、网易新闻等),每个变量均是0-1定类变量,加总后得到均值为2.83、标准差为0.96、取值范围在0到4之间的定距变量,信度检验的alpha系数为0.67。该变量的取值越大,说明个人的疫情资讯来源异质性越高。

最后是控制变量。疫情期间的物理隔离情况也是重要变量之一,因此我们在调查中询问被访者疫情期间与朋友外出聚会的频率。由于线上调查的问卷长度和填答时间有限,无法加入过多的个人特征变量,所以此次调查选取了最能代表个人特征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的5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分别是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和家庭年收入。

五、实证分析结果

基于微信用户调查数据,本节使用多元回归模型,依次检验保持健康、维持常态、平稳过渡等三个研究假设。虽然这些模型同时纳入了问卷回答者个人特征等控制变量(见表1),出于篇幅考虑这些变量的回归系数未予展示。作者对于模型分析结果的解释,聚焦于关系交往紧密性、资讯来源异质性和物理隔离效果三个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

(一) 保持健康假设的检验

表2展示了社会资本对疫情期间保持健康的影响。疫情期间,病毒感染风险是影响身体健康的关键要素,所以被访者对身边感染情况的感知是分析的第一步,由模型1(社会资本变量)和模型2(加入控制变量)来完成。第二步是身体健康变化,由模型3(社会资本变量)和模型4(加入控制变量)来完成。第三步是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感染知情变量,由模型5来完成。五个模型的因变量都是二维变量,均使用Logit模型开展统计分析。

表2 社会资本对保持健康的影响

变量	模型1 感染知情 (Logit)	模型2 感染知情 (Logit)	模型3 健康变化 (Logit)	模型4 健康变化 (Logit)	模型5 健康变化 (Logit)
感染知情	/	/	/	/	-0.56***
关系交往紧密性	0.07***	0.05**	0.05**	0.05*	0.05**
资讯来源异质性	0.09*	0.09*	-0.02	-0.02	-0.01
隔离效果	/	-0.12**	/	0.14**	0.13**
控制变量	略	略	略	略	略
常数项	-2.30***	-0.38	0.79***	-2.31**	-2.07**
Log Likelihood	-1629.50	-1579.14	-1507.29	-1442.18	-1428.50
样本量	3009	2998	3009	2998	2998

注:*** p<0.001, ** p<0.01, * p<0.05。

模型1显示,社会资本的两个变量——关系交往紧密性和资讯来源异质性——对于感染知情都有正向显著影响。这揭示出两个规律:其一,疫情期间,被访者与其核心网络成员之间的交往越紧密,对于身边疫情感染情况的关心程度就越高,所了解的感染病例和疑似病例就越多,因此感染知情程度也越高;模型系数表明,关系紧密性每提升一个单位,则感染知情几率提升7.3%($e^{0.07}-1$)。其二,疫情期间,被访者获取信息的途径越多,预示着交往越广泛,认识的感染者数量相对越多,因此感染知情程度也越高。模型系数表明,资讯来源异质性每提升一个单位,感染知情几率提升9.4%($e^{0.09}-1$)。

模型2显示,隔离效果越好,感染知情程度越低;物理隔离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发展;男性的感染知情程度高于女性;虽然年龄和教育程度对感染知情没有影响,但是蓝领的感染知情程度最高,白领和雇主次之,无业人员最低;而在收入阶层之间,中低收入层的感染知情程度最低,低收入层和较高收入层之间

在感染知情程度上没有任何差别。在控制了上述变量之后,社会资本的两个变量系数仍然正向显著,说明社会资本对于感染知情的影响具有稳健性。

模型3显示,在社会资本的两个变量之间,关系交往紧密性对于健康变化有正向显著的影响,而资讯来源异质性对健康变化没有任何影响。这说明,影响身体健康状况的是内聚社会资本,而不是外联社会资本:疫情期间与家人、朋友的联系越多越紧密,对于自身的健康状况评价越好。具体来说,关系紧密性每提升一个单位,保持健康的几率提升5.1%($e^{0.05}-1$)。

在增加了控制变量后,社会资本的两个变量的系数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见模型4),关系交往紧密性仍然正向显著,资讯来源异质性的系数仍然接近于零,这些都说明模型3结果的稳健性。控制变量对于健康变化的影响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但其结果需解释如下。首先,隔离效果对于健康变化的影响正向显著,说明疫情期间的物理效果越好,则人们对于自身的健康评价也越高。其次,在个人特征方面,女性保持健康的几率显著高于男性,青年显著高于中年和老年。最后,三个社会分层变量的系数显示,虽然教育和职业对于健康变化没有任何影响,但是收入对于健康变化的影响是显著的,总趋势是收入水平越高,保持身体健康的概率越大。

模型5将感染知情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是健康变化的综合分析模型。结合模型1-4的分析结果,我们获得三项研究发现:其一,社会资本对于健康变化存在直接的积极影响,主要来自内聚社会资本的作用。与模型4相比,社会资本的两个变量对于健康变化变量的影响系数和显著度未发生质的变化。其二,感染知情变量负向显著,说明身边的感染者越少,则面临的疫情风险越低,保持健康的几率也就越高。其三,通过感染知情变量的负向显著作用,社会资本的两个变量对于健康变化产生间接影响。综合三项结果可以发现,内聚社会资本是疫情期间人们保持健康的最重要的社会机制。虽然外联社会资本可以带来更多的疫情信息,但对健康变化并不发生直接的影响,而由于它会提升感染知情的程度,所以为了避免感染、保持健康,需要增加内聚社会资本,即通过亲友之间的沟通与互助,使人们得到核心关系圈的社会支持,才能寻找更多的应对办法,抵御疫情带来的风险。因此,表2的核心分析结果支持假设1。

(二) 维持常态假设的检验

表3呈现的是社会资本对维持常态的影响。其中,模型6和模型7为社会资本对于困境解决的影响,使用Ologit模型进行分析。模型8和模型9为社会资本对于家庭关系的影响,使用Logit模型进行分析。模型10将困境解决作为自变量加入模型分析,进一步考察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表3 社会资本对维持常态的影响

变量	模型6 困境解决 (Ologit)	模型7 困境解决 (Ologit)	模型8 家庭关系 (Logit)	模型9 家庭关系 (Logit)	模型10 家庭关系 (Logit)
困境解决	/	/	/	/	0.10
关系交往紧密性	0.12***	0.12***	0.17***	0.14***	0.14***
资讯来源异质性	0.18***	0.18***	0.02	0.00	-0.00
隔离效果	/	0.00	/	0.15**	0.15**
控制变量	略	略	略	略	略
cut1	-0.24	-0.75	/	/	/
cut2	2.34***	1.86***	/	/	/
常数项	/	/	-0.09	-0.81	-0.91
Log Likelihood	-2797.30	-2760.90	-1108.79	-1091.96	-1091.27
样本量	3009	2998	3007	2996	2996

注:*** p<0.001, ** p<0.01, * p<0.05。

模型6显示关系交往紧密性和资讯来源异质性对于解决困境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疫情期间个人之间的交往越紧密,则困境解决途径也越多;获取信息的途径越多,也会有更多的困境解决途径。模型7引入控制变量后社会资本变量的系数未发生质变,说明存在直接和独立影响。同时,隔离效果变量对于困境解决途径的系数不显著,说明物理隔离并不能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上的困境;蓝领职业的平均网上交流时间显著超过白领和雇主,所以他们对于困境解决的途径也显著多于后者;收入对于困境解决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虽然总体上看,收入越高则经济能力越强,解决困境的办法也越多,但是最高收入阶层(>30万元)的该项系数不显著,其行为含义需要深入研究。

由模型8可知,关系交往紧密性对于家庭关系有正向显著的影响,而资讯来源异质性对于家庭关系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疫情期间与家人、朋友交往的紧密性带来的内聚社会资本会显著改善家庭关系,关系紧密性每提升一个单位,则家庭关系维持常态的几率增加18.2%($e^{0.17}-1$)。引入控制变量后关系交往紧密性变量的系数略有下降,但仍然正向显著(见模型9),说明内聚社会资本对于家庭关系具有直接的独立影响。同时,隔离效果变量的系数正向显著,说明物理隔离效果越好,越有助于维持家庭关系。

模型10显示,当“困境解决”作为新的自变量进入模型之后,两个社会资本变量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维持原状,说明内聚社会资本对于家庭关系的影响独立且显著,对人们在疫情期间维持生活常态有着正向的积极影响,假设2成立。同时,困境解决变量在模型中的系数不显著,说明疫情期间的困境解决途径对于家庭关系的变化没有影响。这表明,在疫情期间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时,社会资本的内聚性与外联性可以带来更多的情感和信息,帮助人们解决困难。在面对疫情带来的新危机时,仅解决眼前的困境已经不够,需要更多的情感沟通提升关系紧密性,此时内聚社会资本对于维持生活常态起到重要作用。

(三) 平稳过渡假设的检验

社会资本是否有助于人们提高积极心态,保持幸福感,从而较为平稳地渡过疫情?表4的模型11和模型12展示了社会资本对于积极心态的影响,模型13和模型14展示了社会资本对于幸福感的影响,模型15是在模型14的基础上增加了积极心态作为自变量,考察它对幸福感的影响。

表4 社会资本对平稳过渡的影响

变量	模型11 积极心态 (Ologit)	模型12 积极心态 (Ologit)	模型13 主观幸福 (Ologit)	模型14 主观幸福 (Ologit)	模型15 主观幸福 (Ologit)
积极心态	/	/	/	/	0.42***
关系交往紧密性	0.18***	0.17***	0.22***	0.22***	0.21***
资讯来源异质性	0.18***	0.18***	0.03	0.02	0.01
隔离效果	/	0.21***	/	0.04	0.01
控制变量	略	略	略	略	略
cut1	0.02	0.70	0.89***	-0.27	0.03
cut2	1.45***	2.15**	3.17***	2.05***	2.38***
Log Likelihood	-2005.12	-1966.10	-2885.90	-2845.98	-2823.74
样本量	3009	2998	3009	2998	2998

注:*** p<0.001, ** p<0.01, * p<0.05。

模型11显示,社会资本的两个变量对于积极心态的影响均正向显著,说明疫情期间的内聚型和外联型社会资本都可以提升个人的积极心态。模型12引入了控制变量以后,两个系数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且依然正向显著,说明社会资本对于积极心态具有独立影响。同时,隔离效果变量的系数正向显著,说明有效的物理隔离可以带给人们安全感,从而提升积极心态。

模型13表明,关系交往紧密性对于主观幸福有正向显著的影响,而资讯来源异质性对于主观幸福的

影响不显著。这说明,疫情期间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可以通过内聚社会资本的积累得到提升,但和外联社会资本无关。模型14引入控制变量后,关系交往紧密性变量的系数几乎没有变化,这支持了内聚社会资本影响的独立性。

由模型15的结果可知,将积极心态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后,社会资本的两个系数和显著度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说明内聚社会资本对于主观幸福的影响独立且显著,对于疫情期间的平稳过渡有正向的积极影响,假设3成立。同时,积极心态的系数正向显著,说明疫情期间的调整心态的重要性,心态越积极则幸福感越高。这表明,社会资本对于心态的调整有积极作用,这种积极的心态同样可以帮助人们提升幸福感,有助于危机调适,其中更重要的仍然是以紧密性为特征的内聚社会资本。

六、结论与讨论

新冠肺炎疫情是风险社会及其问题在当今世界的集中体现。本文聚焦个体和家庭面临的三项疫情风险的挑战,通过对最新调查数据的分析,考察社会资本在迎接这些挑战中的作用,得到如下实证发现:第一,疫情期间,关系交往紧密性和资讯来源异质性都将提高人们对于身边感染个案的知情程度,从而导致对于自身健康状况的焦虑,而感染知情程度的提升导致自评健康状况的相对下降。但与此同时,关系交往紧密程度越高,人们之间有助身体健康的积极互动和相互帮扶越到位,因而保持身体健康的几率显著提升。这是内聚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第二,关系交往紧密性和资讯来源异质性不但显著增加个体和家庭解决疫情困境的途径,而且关系交往紧密性还有力地维持了家庭关系不受疫情风险的影响,保持家庭生活常态,再次彰显了内聚社会资本的特殊作用。第三,关系交往紧密性不但提升人们应对疫情风险的积极心态,而且直接保持和加强人们的幸福感。与此同时,资讯来源异质性通过提升人们的积极心态来间接地保持和加强人们的幸福感。

基于上述实证发现,本文得到两大研究结论:第一,在风险社会中,联系性依然发挥重要作用。贝克所描述的具有后现代性特色的风险社会中,人们形成了超越阶级与地位的个体化趋势,但这种个体化并不是孤立的原子化,人际互动与合作仍然是个体最基本的需求。当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风险来临,个体化表现为物理层面的隔离状态时,可以对疫情的有效控制起到关键性的帮助作用;而当个体化表现为社会层面的个人状态时,则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相互帮扶、相互救助、相互支持的重要性,这正是社会资本的主要功能。第二,社会资本是应对和调适疫情风险的有效社会机制。其中,内聚社会资本的作用是直接的、正向的、稳健的。我们考察了疫情应对和调适的六个方面,从感染知情和健康变化,到困境解决和常态维持,再到积极心态和主观幸福,以关系交往紧密性为特征的内聚社会资本对于每个方面均有直接的正向作用,即使控制了被访者的个人特征变量和社会地位变量之后,它的作用仍然是持续显著的。比较而言,以资讯来源异质性为特征的外联社会资本,其作用往往是间接的、不甚稳健的——它通过影响感染知情来间接地影响健康变化,但是作用性质是负向的;它扩大了人们的困境解决途径,但对维持生活常态不起作用;它提升人们的积极应对心态,由此影响人们的幸福感,作用性质是正向的。这说明,以核心关系圈的紧密互动为特征的内聚社会资本,是我国人民防疫和抗疫的主导社会机制。

如何理解上述结论?长久以来,核心关系网络在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30](P3-19)。在疫情风险的威胁下,内聚社会资本既是个体应对风险的安全网,能为人们保持身体健康、解决现实困难、维持生活常态提供社会支持,同时又是在高度不确定性中维持本体性安全的定心丸,帮助个体获取疫情信息、增强积极心态、平稳渡过疫情。内聚社会资本的测量不但包括了疫情期间夫妻家务劳动的时间、家庭成员间的交流频率、关系变化等家庭内部关系的测量题器,还调查了与好友的线上交流频率,这是信息社会背景下内聚社会资本测量上的创新。这意味着,当疫情带来的社会隔离切断了物理社会联系,信息时代的内聚社会资本转而通过电子通信和社交媒体来打破这种隔离,保持核心关系圈的紧密互动联系,避免风险社会的个体化危害和灾难的侵袭,发挥防疫和抗疫的积极作用。

面对新冠疫情这类危及公共健康安全的风险,社会资本这一历久弥新的资源,仍然可以为个体的风险应对与调适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疫情防控仍不容松懈,当常态化疫情防控逐渐成为持久战,加强对社会资本的培育也应该成为防疫和抗疫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环。

必须说明的是,由于线上调查受到的限制,不能测量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对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测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可能影响相关数据分析和结论。在灾害社会学研究领域,从抗战时期的社会救助,到合作化时期的村民救助,再到汶川震后的社区救助^[12](P76-83),中国社会资本抵御风险的功效是通过亲友网络发挥作用的,体现出内聚社会资本的一般性原则。然而,外联社会资本表现为社区之外的人际联系,用信息来源异质性加以测量是疫情期间物理隔离条件下相对有效的替代方法,但与外联社会资本的传统内涵存在一定偏差。在未来的研究中,应通过扩大测量指标、增加测量效度和信度、追访被访者等多种方式修正上述不足,以更准确地分析内聚和外联社会资本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成伯清.“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2).
- [2]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Trans. Mark Ritter.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 [3] 李路路. 社会变迁:风险与社会控制.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2).
- [4] 肖瑛. 风险社会与中国. 探索与争鸣,2012,(4).
- [5] Peter Kelly. Youth at Risk: Processes of Individualization and Responsibilisation in the Risk Society.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2001, 22(1).
- [6] 王小章. 论焦虑——不确定性时代的一种基本社会心态. 浙江学刊, 2015, (1).
- [7]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田禾译.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00.
- [8] 李友梅. 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一种新路径. 社会,2008,(6).
- [9] Osmo Kivinen, Sakari Ahola. Higher Education as Human Risk Capital. *Higher Education*, 1999, 38(2).
- [10] 赵延东. 社会资本与灾后恢复——一项自然灾害的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研究,2007,(5).
- [11] 王中豪, 罗家德, 梁肖月. 社会资本对灾后重建参与及恢复效果的影响. 社会与公益,2018,(4).
- [12] 洪岩璧, 赵延东. 灾后重建中的资源再分配与健康不平等——基于三期汶川地震重建调查. 社会,2019,(6).
- [13] Nan Lin. Social Networks and Status Attain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9, (25).
- [14] Glenn C. Loury. 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 *Discussion Papers*, 1976.
- [15]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John Richardso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 [16] James S. Coleman.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94).
- [17] Nan Li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8] 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 [19] Sven Horak, Fida Afrouni, Yanjie Bian, et al. Informal Networks: Dark Sides, Bright Sides, and Unexplored Dimension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20, 16(3).
- [20] Jia Miao, Donglin Zeng, Zhilei Shi. Can Neighborhoods Protect Residents from Mental Distres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vidence from Wuhan.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2020, (1).
- [21] Ronald S. Burt, Katarzyna Burzynska. Chinese Entrepreneurs, Social Networks, and Guanxi.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7,13(2).
- [22] Yanjie Bian. *Guanxi: How China Work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9.
- [23] Kwang-kuo Hwang.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7, 92(4).
- [24] Marlène Sapin, Dominique Joye, Christof Wolf et al. The ISSP 2017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Resources Modu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2020, 50(1).
- [25] 边燕杰, 李煜. 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 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2).
- [26] 边燕杰, 张磊. 论关系文化与关系社会资本. 人文杂志,2013,(3).
- [27] 郭小弦, 王建. 社会支持还是参照群体?——社会网络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的考察. 社会科学战线,2019,(1).

- [28] Yanjie Bian, Lei Zhang, Yayi Gao. Social Bonding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Findings from the 2017 ISSP Modu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2020, 50(1).
- [29] 微信发布数据报告:2019年微信月活账户数为11.51亿. 腾讯云, 2020-01-09. [2020-03-20]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news/568268>.
- [30] 边燕杰, 缪晓雷. 如何解释“关系”作用的上升趋势? *社会学评论*, 2020, (1).

Social Capital and Responsive Resistance to Epidemic Risk

Bian Yanjie, Miao Xiaolei, Lu Xiaolin, Ma Xulei, Guo Xiaoxia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a manifestation of risk society. A new survey shows that social capital as an effective social mechanism helps people keep physical health by increasing their coronavirus awareness, maintain normal life by expanding ways of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and survive the epidemic by developing their positive attitudes during the difficult times of the pandemic. The analysis also demonstrates that bonding social capital characterized by intensified social interactions within core personal networks is dominant with direct, positive, and robust effects, while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characterized by heterogeneity of information sources is supplementary, with indirect and inconsistent effects. The overarching message of this study is insightful and inspiring. While physical isolation caused by measures of stay-at-home and community lockdowns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may get people separated from one another, bonding and bridging social capitals connect them through offline and online social contact, thus helping to maintain both core personal networks and more distant alters, reducing individualization costs of risk society, and enhancing people's social power to combat the epidemic.

Key words risk society; epidemic risks; social capital; risk management; cost of individualization

■ 收稿日期 2020-11-30

■ 作者简介 边燕杰, 社会学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陕西 西安 710049;
缪晓雷,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鲁肖麟,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马旭蕾,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郭小弦(通讯作者), 社会学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 责任编辑 李 媛